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一种衍生的话语？

Partha Chatterjee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 著 范慕尤 杨 曦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一种衍生的话语？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 著 范慕尤 杨 曦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 / (印) 查特吉 (Chatterjee, p.) 著; 范慕尤, 杨曦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10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ISBN 978-7-5447-0235-5

I. 民... II. ①查... ②范... ③杨...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②殖民地问题-研究 IV. D091.5 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681 号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by Partha Chatterjee

Copyright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Zed Books

ISBN of the original English volume: 0 86232 552 8 & ISBN 0 86232 553 6 pbk

URL of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ww.unu.edu/unupress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English version i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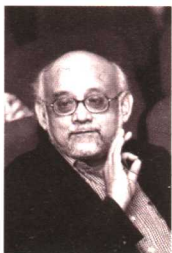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064号

书 名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
作 者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
译 者	范慕尤 杨 曦
责任编辑	黄 颖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35-5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帕尔塔·查特吉 (1947—)

政治学家，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庶民研究”（又称为贱民研究或底层研究）学派的主将，对当代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具有创造性的贡献，被誉为印度最重要的批判知识分子，他被视为法农之后，少有的同时被第三世界和英美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学者。





本书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查特吉对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复杂纠结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他提出的作为“衍生的话语”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成为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

责任编辑 黄 颖
封面设计 胡 茫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谨将此书献给拉那吉特·古哈和阿肖克·森，
从他们那里，我学到最多。

前 言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的最后一幕,引用了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由于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阻碍的,因而这个论断有反讽的意味。可在秩序混乱的政治领域中,这却可以被看作真理。

很明显政治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这个事实,即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在政治家那里,概念是不明确的,这样概念就有了政治价值,因为不明确所以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在那里目的自相矛盾,而结果则不可预料;行动变幻莫测;选择都是战略性的,相对的而不是单义和绝对的。然而,这个充斥着模糊和虚假、操纵和欺骗、梦幻的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这里,明确了目的,建立了规则,确立了价值,完成了革命并建立了国家。

这本书是有关政治革命的,但其过程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即从历史中选取起因和高潮两点,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有论点指出,革命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革命。在转变、动摇、中断以及无法预测的变化中,被支持的和受到压制的东西一样多,从中你会意识到在这一复杂运动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要多于那些偶然的或干扰性的因素。通过研究形式不一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理解民族主义思想史在今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曲线》,但比我精通出版业务的朋友劝我

说,这不是一个挖掘潜在读者的好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vii 我于 1981—1982 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期间动笔写作本书,我非常感谢 Nuffield 基金会给我的出国奖学金。1982—1983 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期间,继续写作本书,回到加尔各答时已完稿。对于牛津大学 Bodlian 图书馆,堪培拉 ANU 图书馆,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图书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图书馆馆员的帮助,我万分感激。

曾看过及评论过本书初稿的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沙希德·阿明,贾苏特罗·伯格奇,迪拜什·哲格罗伯蒂,约翰·达恩,欧姆卡罗·古斯瓦米,拉那吉特·古哈,德伯蒂·古哈·塔古达,苏迪伯达·卡维拉吉,鲁德罗·穆凯吉,哥耶·班代,阿毗吉特·森,阿肖克·森。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谨此致谢。

我在阿尔及尔、牛津、堪培拉、巴罗达、巴黎和加尔各答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讨论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在此向所有与会者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学的金海德·穆会古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Zed Books 的罗伯特·摩太诺和安娜·格沃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拉维·达耶勒,鲁古·俄德弗尼,在本书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同时谢谢梅·迈肯思和玛格丽特·豪准备打印稿。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卡马丽的支持和理解。

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伽利略传》，第十四幕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政治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001
第二章 主题与问题	045
第三章 分离期：班吉姆钱德拉思想中的文化与权力	067
第四章 策略期：甘地与对市民社会的批评	110
第五章 完成期：尼赫鲁与消极革命	181
第六章 理性的狡黠	234
参考文献	240
索引	249
译后记	259

第一章

政治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一个人要让自己去解决之前已经圆满解决的问题是多余的，是无知的表现，甚至是恶意的表征。

——阿布·贝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巴哲(阿文巴彻)*
《认一论者之安排》

1

在约翰·普拉默那茨(John Plamenatz)的一堆默默无闻的文稿中，有一篇谈到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①在这两者中，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它常常以“政治形式”出现。一种类型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另一种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这两种类型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标准的基础上，这一标准

* Ibn Bajjah (拉丁化为 Avempace)(? —1138)，西班牙穆斯林哲学家，科学家。
——译者注

① 约翰·普拉默那茨，《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收于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编，《民族主义：一种思想的本质与演化》，伦敦，Edward Arnold, 1976 年版，第 23—36 页。

是用来衡量各民族文化发展情况的。然而,在第一种类型中,虽然可以感觉到在其他方面此民族处于劣势,但它已经“从文化上武装起来”,来去除那些不足。因此,虽然可能是法国或者英国为其他地区设定了关于进步的全球新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建立在“人、道德和社会”这一套观念的基础上,而这些观念的社会和思想根源基本都来自西欧。法国和英国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领跑人,并可能因此受到羡慕或嫉妒,但是在它们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同时,在“认为自己已经高于其他民族”的西欧,出现了“国际礼让”。结果,当民族主义在西方其他国家出现时,尽管根据领跑者设定的标准,它是弱势意识的产物,但能感觉到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已经武装起来,竭力去达到那些标准。例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已经有了必要的语言、教育和职业技能,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注重进步的文明”所必须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文化上借用外族的来武装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对普遍标准的接受使人们产生了对弱势的认识,但从根本上看,普遍标准本身并没有被看成是和民族文化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东方”民族主义出现时的情况是,“人们才刚刚被拖入一种迄今为止对他们而言还是陌生的文明中,他们祖先的文化不适应于世界性和日益占优势的标准的成就和优点”。他们也按照西欧先进民族推行的全球化标准判断出了本民族的落后状况。但在这里有一点很特殊,即他们也认识到这些标准来自外国文化,本民族传承的文化并不具备使自己达到那些标准的必要条件。因此,“东方”型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文化上“重新武装”这个民族,要改造它的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异族文化,因为这样民族将会失去自己的特性。因此要尝试去复兴民族文化,使其既适应进步的需要,同时保留其独特性。

这个尝试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者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

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因此这个矛盾的进程同样令人困扰。“东方的民族主义既纷乱又矛盾，而赫尔德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就不会这样。”

不同于普拉默那茨的其他著作，这篇文章既没有被激烈地评论，也不是特别深奥。但在区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时，文中清楚地指出了，在讨论民族主义思想时会陷入的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由理性主义的两难状况的前提。在一些标准的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民族主义史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状况，最明显的是在汉斯·科恩的著作中。^①这部历史著作将民族主义作为自由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普遍历史同期，它的发展也是见证了工业化和民主出现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代表了一种尝试，即以政治方式将大众对自由进步的普遍要求付诸实施。然而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它也会导致愚昧无知的沙文主义和仇外情绪的膨胀，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和暴政提供辩护。作为自由进程的一部分，民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它可以实现理性的和广受称道的政治目标。但最近的历史给人们的感受并非如此。它是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的源头；它为纳粹和法西斯的残暴提供辩护，在殖民地它衍化为种族仇恨意识，它还催生了毫无理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和当代的最高压政权。这些都有 2 力地证明了，民族主义和自由往往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

区别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是和自由主义的两难相妥协的一种尝试。其实科恩也在“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之间，^②后来也在“正

①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理念》，纽约，Macmillan，1944 年版；《民族主义，其意义及历史》，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Van Nostrand，1955 年版；《民族主义时代》，纽约，Harper，1962 年版。

② 有关对科恩的划分的讨论，见艾拉·凯米莱宁（Aira Kemiläinen），《民族主义》，Jyväskylä，Kasvatusopillinen Korkeakoulu，1964 年版，第 115 页及以下。

义的”民族主义和“邪恶的”民族主义之间做了这种区别。^①这种区别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概念是如何被歪曲，以致产生了专制的运动和政权。先要在常规的民族主义和特定的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一种二分法，常规的类型是古典的、正统的、纯正的类型。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先进观念以及现代民主有着共同的物质和精神前提。它们形成了一个历史的统一体，从地理和历史年代方面都清晰地定义了这一点。这就给了自由理性主义者一种范式，证明民族主义是和理智、自由、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而特定的类型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因而是复杂的、不纯正的、经常偏离常规的。它代表了一个艰难、矛盾、可能非常“令人困扰”的历史进程，自由理性主义者认为它并不一定包含着反自由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特定的类型，在它不利的条件下运作，它往往可能是反自由的。普拉默那茨说：“无疑地，民族主义者往往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那主要是因为在不利于自由的条件下，他们总表现得很积极，就像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其实，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我看不到逻辑的不一致。”事实上，“东方”型的民族主义接受并且重视进步的理念——并极力想使原有的

① 见Ken Wolf,《汉斯·科恩的自由民族主义：作为先知的历史学家》，《思想史杂志》，第三十七卷第4期（1976年10/11月号），第651—72页。美国民族主义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 Hayes）提出了一套关于民族主义从一种自由主义，人道，和平的方式向反动，利己，暴力的方式“退化”的理论。见卡尔顿·海斯，《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纽约，R.R.Smith, 1931年版，及卡尔顿·海斯，《民族主义：一种宗教》，纽约，Macmillan, 1960年版。近些时候休·赛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基于对“旧”民族与“新”民族的划分，写了一部比较民族主义运动史。“旧民族是那些在民族主义的学说形成之前，已经取得了民族认同或民族意识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包括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丹麦人，瑞典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对于新民族而言这两个进程是同步发展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这两个进程是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的作品。”赛顿—沃特森，《民族与国家：探询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伦敦，Methuen, 1977年版。

文化转型,以求更好地适应现代世界——意味着权威的古旧形式被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人首创性和个人选择的条件被创造出来,科学与现代教育得以传播。在一种基本的历史意义上,这正是一种解放。以至于当这种民族主义以宗教复兴运动或专制政权的形势出现时,它还是代表了对进步和自由的追求。

我们必须将这种民族主义看成社会、思想、道德革命的一部分,而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也是这一革命的产物。民族主义是和这种渴望相联系的,甚至致力于强化这种渴望,并为它们的实现创造社会条件,即使有时民族主义曲解了它们。

因此自由理性主义者将不合于经典形式的例子指为偏离常规的,从而维护其范例的纯正性。但他会认为甚至在这些事例中,还是可以辨认出对经典理念的追求。这种偏离可以用特殊情况来解释,即在某些国家当条件“不利于自由”时所做的尝试。这意味着偏离的具体情形要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即通过把曾经发生的各种实例集中分类,然后就可以建立涵盖这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内洽的体系,它可以作为各种类型的偏离的原因。^①

举例来说^②,论证可以首先从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开始,但要从人有能力即“为工业社会做贡献并从中获利”的认识中了解其本质。然后谈到传统社会“结构”的腐坏,传统社会被看成是一个角色关系

① 这样的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或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各种民族主义理论》,伦敦,Duckworth,1971年版;或更近些时候约翰·布留利(John Breuilly),《民族主义与国家》,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厄内斯特·盖尔纳,《思想与变化》,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4年版,第147—178页。